

“要干些呆事”的汪孟舒

■ 严晓星

汪孟舒最大的兴趣在古琴与文献。在琴人群中,他不以弹奏见长,了解他学问的亦不过二三子而已;在文献学家群体中,古琴文献基本不受关注。走这条治学之路,他终究还是有些寂寞的吧。

1929年暮春,刚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徐中舒收到了陈寅恪的一封信:

中舒先生:敬亲汪孟舒,人极好学谨慎,素治中国音乐。前在北平图书馆阅旧书,今图书馆新章,须学术机关担保,请援上次,葛君若例,转告孟真先生照式填写盖章送下,以便转交为感。勿此奉恩,敬叩 著安

弟 寅恪拜恩 四月廿一 附保证书式 径启者,兹保证汪孟舒前赴 贵馆善本阅览室研究古琴音律问题,所有开具各项事实均属实情,对于贵馆各项规则之遵守,保证人愿负完全责任。此致 国立北平图书馆

熟悉陈寅恪生平者,不难知道他有一位擅长弹琴的母亲,但他与琴人汪孟舒(1887—1969)是亲戚,仅赖此一函相传。汪孟舒是苏州人,或与已故的陈寅恪曾祖室汪春琦同族。不过,文化家族的姻亲关系并非重点,我关注的则在陈寅恪对汪孟舒的评价:“好学谨慎,素治中国音乐”,“研究古琴音律问题”;而且,汪孟舒在北平图书馆看书大概已经有一阵子了,只是新规章出台,没法继续看下去,不得已才求助于陈氏。

这一年,按照传统的算法,汪孟舒已经四十三岁了。当时的北京琴坛,他的古琴老师叶诗梦(1863—1937)与琴坛奋斗时百(1864—1931)都已垂垂老矣,只是一个斯人独憔悴,一个还志在千里地发奋著书;风头正健的,是张友鹤(1895—1940)与郑颖孙(1894—1950);后来名重当道的管平湖(1897—1967),刚学完那首著名的川派《流水》还没多久,大片光阴消磨在国画之中。汪孟舒当然也悠悠游于他的丹青生涯,但当时他似乎更热衷于光影世界。五年多以前,他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后来称作“光社”;差不多三年前,同样爱好摄影的郑颖孙也入社。这大概是这对琴友兼影友交往最为密切的时期。从许多史料中得到的印象,郑颖孙才华横溢、绝顶聪明,性情敦厚而不失活跃,文人派头大过学者气质。这样的人往往眼界极高,略肯任事而不愿轻易著述,让他像汪孟舒一样长期泡在图书馆里,大约是耐不住的,参与编一部很繁杂的书还差不多——比如近年元旦出版的《北平光社年谱》第二集。这也是光社的最后辉煌,随着社中几位主要人物的各奔东西,光社也就在无形中解散了。

今年8月,在坦桑尼亚阿鲁沙召开了以“语言、人与环境,为了更美好的世界”为主题的第10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这是世界语大会第一次在非洲举办,好似补齐了“世界”之义的拼图。

诞生于1887年的世界语,代表了百多年间人类对世界主义的种种畅想与实践。19世纪资本主义急剧扩张和与之相伴的技术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认知模式与交往模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使世界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如作更深入的探寻,我们会发现,世界主义也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论述的“想象的共同体”有关。安德森认为,印刷资本主义勃兴中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内容是去神圣化——正是印刷术的同一性和可重复性,“使自然世界和权力世界都抹去了神圣的色彩”,拉丁文在欧洲各地的行政语言地位也逐渐被地方语言取代,知识不再局限于少数人、少数阶级。而去神圣化在晚清以降的中国语境中也有明显展演,这就是与世界语同时发端、更为我们熟悉的白话文运动。

1911年吴天民《奉天世界语学社发生之历史》中说:“西人著作与我国人著作迥然不同,西人每日可写二三百,我国人至速亦不过三四千,非机械之不动也,因我国习俗以作字不工为不敬……我国文字向以神圣视,一旦骤欲变更,必有非之者。故本司虽有此意,蓄之数载未敢表白于世也。今诸君创立此世界语学社,亦无非欲求其文字之简便,俾得通行于全球,文字相通可造世界和平,其理至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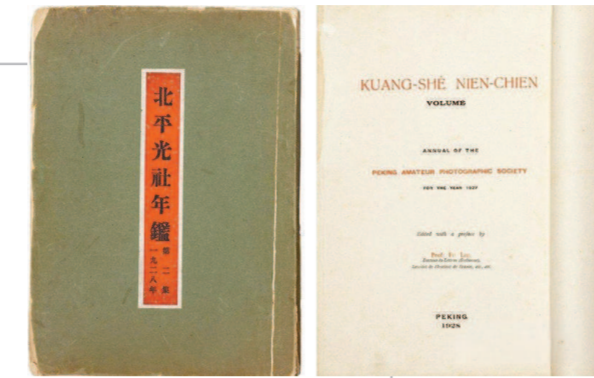
▲ 管平湖、汪孟舒、关仲航

《北平光社年谱》第二集出版与陈寅恪为汪孟舒写介绍信之间,仅相差一个多月,是不是巧合,当然无法遽下判断。陈寅恪说汪孟舒“素治”中国音乐,想来并非刚刚起步,而是早就着手了的,但证明汪孟舒研究古琴的材料,却的确是从那时起渐渐多了起来。后来有一阵子,他经常在电台弹唱琴歌,曾教张伯驹(1898—1982)弹琴,为袁荃献(1920—2003)启蒙琴、画,再后来又留下过两首小操的演奏录音,但孜孜努力的始终不是琴艺,而是琴学。他毕生的成就,也正在古琴的文献研究与整理。五六十年代,他油印过几种琴学著述:《编年考存琴书简表》《乌丝栏指法释》《古指法考》(与管平湖、王迪合作)《乐圃琴史校》。这些加上其他一些琴学札记,也都经杨元铮先生汇编为《古吴汪孟舒先生琴学遗著》,前些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著作集出版之前,了解汪孟舒的古琴爱好者是很有限的。他们可能会在介绍北京古琴研究会的某些材料里看到这个名字和照片,可能会在关注高罗佩或王世襄生平之余看到这个名字,可在当时业已出版的古琴录音中却怎么都找不到他的演奏录音,也很少有人将他置于20世纪杰出琴人的行列。充其量,大家会津津乐道于这样一个故事:他是那张著名的宋宣和内阁旧藏唐代雷琴“春雷”的主人,他守着这张发不出声音的绝世名琴,终身不愿加以修理,也终身未能一赏旷古遗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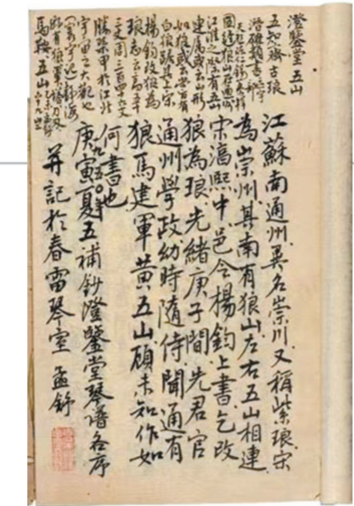
陈寅恪为汪孟舒写介绍信的十年之后,杨时百、叶诗梦次第凋零,张友鹤、郑颖孙先后离京,汪孟舒、管平湖等仍然不辍微弦,经常参与章宝臣主持的风声琴社雅集。就是在雅集中,年过半百的汪孟舒认识了一位不足而立的年轻人凌其阵(1911—1984),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三十年的忘年交谊。凌其阵有个爱好正与汪孟舒相投,便是搜集古琴谱书。在汪孟舒的书房里,他大开眼界。在此后的岁月中,他们聚少离多,却频通鱼雁。数十年劫波后,汪孟舒给凌其阵的书札还存世四十八通,其中关于琴籍寻访、录写、校勘、整理的交流,分量最重。仅举四十年代数通为例:

《秋鸿》谱已与《琴韵》原本及《天闻》



▲ 《北平光社年谱》第二集书影

▲ 澄鉴堂琴谱,汪孟舒题跋本



刊本分别校过,兹特寄还。鄙意此两刻中均尚有小差,但无伤大体。……弟近日正在录写《蕤宾窝(鸡)》琴谱,计十二本,抄得一半矣。他日吾兄来京得一观其内容,明代珍秘琴谱,亦可谓观止矣。(1944年6月3日)

所见《响雪山房》《绿榕山馆》琴谱两种,如荷 得闲示大略,殊所欣盼,不敢请耳。拙录例:谱名,第卷,著者,封面,出版处,何人序跋(序文节记要点大概,空泛不录),目录中谱名、某调共几页、几段,有少见曲特录存之。将来备为《琴书目要》资料刻稿本,故所录采之也。(1948年6月20日)

承抄谱目,感甚。其中《塞上曲》曲既有二,又有南北之分,段数不同。足下倘有此笔,殊为珍要,便中赐示,俾得流传为盼。……《琴学心声》弟已抄补齐十之八九,添装二本,其一为他书亦有,亦不重要之谱题耳。他日可将此本与查阜西兄所藏一较版本全否也。(1948年8月23日)

郑颖孙(孙)兄所藏琴谱之胡文煊(文会堂)、行有恒堂中箱精抄本及陈敦舟三种,弟所无之,而弟之黄献《梧冈》明刊琴谱、《五知斋·梦蝶》未依本、黄溯本《太古遗音》抄本、《律话》抄本、《琴学心声》、其他零星数种,彼亦无之。吾二人所藏亦不可多得,惜周湘灵(聆)君之遗藏不知散失于何所矣。(1948年11月6日)

这些书札,透露出许多学术史的线索,也记录了在当时的环境之下,琴人获取古琴资料的艰难,让今天的我们不由得生出许多的感慨,同时也心生庆幸。如今琴人可以轻易坐拥一套煌煌三十册的《琴曲集成》,却很少去想这些印数极少、有的甚至是抄本稿本的琴谱汇集在一起何其不易。在五十年代以国家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古琴文献之前,古琴典籍的搜集与整理,全赖琴苑中的有心人上穷碧落下黄泉。前辈如周庆云(1864—1933),次一代如汪孟舒、查阜西(1895—1976),他们的努力,奠定下现代琴学文献的基础。周庆云、查阜西

的人生,除开古琴还别有洞天,而汪孟舒,就在眼前发黄的信笺上演绎着自己的故事。汪孟舒擅画山水,此刻,古琴书卷就是他的山山水水,他流连其中,乐而忘返。正如他在另一封信中的夫子自道: 所以吾们呆子要干些呆事。(1956年6月18日)

我亦有幸,得到了汪孟舒先生的短札一通:

风起先生足下:曩岁承传钞铁琴铜[剑]楼之《琴苑要录》(年表12),其中略有脱讹。舒近自《西麓堂谱》(27)及《琴书大全》(35)校出补正。尊处倘所需者示知,暇当奉备参考。专此,并请 年安

弟汪孟舒拜启

甲午冬至前一夕

收信人瞿凤起(1908—1987),名照邦,江苏常熟人,版本目录学家,铁琴铜剑楼第五代主人。铁琴铜剑楼藏书私化为公,他居功甚伟。“甲午冬至前一夕”为1954年12月21日,此时他在建成不久的上海图书馆工作。

短札字不足百,所涉却及于多方,试为一解读之。

《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仲伟行等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录有瞿凤起《琴史》跋一则云:

瞿长文《琴史》通行惟曹棟亭扬州诗局十二种本,脱讹至多,读者病焉。吴县汪孟舒兄精于音律,知余有明钞本,属为校勘,颇多是正。别有《琴苑要录》、《琴统》及《懒仙五声谱》三种,均无刻本,并为录副,附记于此。戊寅冬季常熟瞿照邦。

从这则关于1939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戊寅季冬)的跋文可知,除了替汪孟舒以明钞《琴史》校书,瞿凤起还为他抄录了《琴苑要录》《琴统》《懒仙五声谱》三部古籍的副本。短札中所云“曩岁承传钞铁琴铜[剑]楼之《琴苑要录》”,当就此而言。《琴苑要录》为十种唐宋琴书的汇录本,包括《古操十二章》《则全和尚节奏指法》《琴书》《琴声律图》《碧落子斫琴法》《斫匠秘诀》《琴笈》《续琴笈》《风俗通音声论》《姚兼济琴论》,内容极为丰富。短札中提及的《西麓堂谱》即《西麓堂琴统》,为天津琴人李允中所藏抄本,《琴书大全》为北京音乐家盛家伦所藏明刻本。这两部书搜罗前代古琴材料极为丰富,不少与《琴苑要录》中的内容重复或密切相关,堪为校勘之助;又都是到了1950年代初期才为瞿凤起所关注,之前鲜为人知。所以汪孟舒特地去函告知瞿凤起,并说“尊处倘所需者示知,暇当奉备参考”,投桃报李,正是君子之交。

短札中的数字,系指这三部书在汪孟舒编《编年考存琴书简表》中的编号。《编年考存琴书简表》油印于癸巳

(1953)中秋,将汪孟舒所藏、所见、所知的琴书一一编号登记,注明作者、年代、卷册、版本、主要内容与特点,收藏人与机构,凝聚了他焚膏继晷的半生心血。汪孟舒当早以此书赠瞿凤起,括注编号无疑是为了便于他翻检。为使用者考虑,至于细微,正是文献学者的基本素养。

铁琴铜剑楼对学界利用藏书持开放态度,向来受到称颂,这通短札也是一个例证。就这部极其珍贵的明正德戊寅(1518)钞本《琴苑要录》而言,早在民初即已供琴人传写。目前可知最早的,是《琴书存目》(1914)所载的上海琴人周庆云所藏钞本与民国甲寅(1914)的无锡琴人赵宜宣钞本(《梁溪琴存:无锡古琴传谱研究》),前者又衍生出民国十四年(1925)桐乡冯水借周藏本转抄之本。在1939年初瞿凤起提及刚为汪孟舒“录副”之后,1950年,查阜西也曾托同为常熟人的吴景略向瞿凤起借钞(查阜西《琴苑要录》跋)。如今,《琴苑要录》已正式出版,化身千百,再无失传之虞了。学者琴人,但凡有意,皆不难得而用之。古代古琴文献积累到今日的规模,离不开藏书家的贡献。

瞿凤起既让别人抄录自家孤本,又把藏书捐出去,汪孟舒一定是引他为同调,列名“吾们呆子”之榜的。说到底,这通短札还尽是些“呆子”们的“呆事”。

最初对汪孟舒产生亲切感,多少有些“推己及人”。他的父亲汪开祉(1868—1935)曾在南通任职,“光绪庚子间,先君官通州学政,幼时随侍……”;当大家还在把五山老人徐大生这些清代琴史上的重要人物当作扬州人时(就连查阜西,都把“同里范国祿”误解为苏州同里),他已对“澄鉴堂五山”“五知斋古琅”做出了正确的解释,等于指出他们都是南通人。后来自己对古琴文献越发关注,折服于他的功夫与功力之余,不免也呆气日增,见呆思呆起来。搜集一通他的信札,当然不无有补于琴史的念头,但更重要的,还是临纸骋思,寄托一点对前辈的仰慕之情。

汪孟舒最大的兴趣在古琴与文献,很自然地在古琴领域最关注其文献,在文献领域最关注古琴内容,成就也在二者的交汇点“古琴文献”。他的接触圈子,相应地分成琴人与文献学家两个群体。在琴人团体中,他不以弹奏见长,了解他学问的亦不过二三子而已;在文献学家群体中,古琴文献基本不受关注。走这条治学之路,他终究还是有些寂寞的吧。

瞿凤起之外,文献学家如傅增湘、卢弼、顾廷龙与汪孟舒都有往还。前些年又得师友赐告,王欣夫1958年10月29日、11月9日日记里也都写到他。但他与文献学家的合影似乎很少,与琴人的合影却留存很多。照片里,他个头高高大大的,总那么显眼;而且人也长得粗粗的,迥异于世俗对苏州人的印象。他经常在见面,隔着镜头都有动感,即使没笑,也面含笑意,一点都不寂寞,更没有丝毫失意的气。他似乎很早就认准了自己最擅长什么、最喜欢什么,就这样做了一辈子“呆事”。

(作者为苏州城市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象》,2017)。与此同时,192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思潮由个人向集体,由重文化向重政治的转变,世界主义的内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的提倡者,更多是搭载它使中国进入以欧西为目的地的世界,此后的提倡者则更多指向以民族独立为旨归的国际主义。在《Esperanto》易学易懂,运用又灵活的,的确是弱民族联络的最好工具。”(施仲南《从国际观察世界语的功用》,1930)1933年9月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第二次大会上曾喊出过“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1938年5月在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延安世界语者协会,中国的世界语运动“跳出了‘中立主义’的坟墓而获得新生,它高举着‘为民族解放而世界语’的旗帜……世界语,它成为了前进的国际主义者的桥梁,它成为了千千万万奴隶大众的传声筒,它成为了全世界弱小民族互相联络团结的工具”。世界语迎向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延安世界语者协会成立大会宣言》)的烈火。

世界语虽然从未获得真正意义的普及,但它也没有“博物馆化”,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持续承载、传导人类关于真与善的合众理想。而它的中国之旅——无产阶级的拉丁语”,是工人阶级的语言,可促使工人实现真正的联合。曾有学者分析过世界语为中学生、师范生和实业学校学生所带来的希望(邓军《制造“希望”:1920年代中等生的世界语想

精神的伴侣很好

■ 王蔚

蒋复璁和梁实秋主编的1969年版《徐志摩全集》收有一通徐志摩写给梁实秋的手札,落款“星五”,编者系于1930年10月24日,此后的徐志摩全集和书信集均沿用这一日期。信中提到:

“适之不日(二十八)北去,遵陆不依水,有所戒也……《诗刊》广告,想已普及,一兄与秋即不可不挥毫以长声势,不拘短长,定期出席。”

结尾问候了“秋声”“秋郎”“一多”“大伴”“春翁”。

胡适日记记载,1930年9月29日,他从上海乘船北上,赴北平参加协和医学院董事会会议,途经青岛时连续两天遇到大风,船无法进口,10月4日晚间方抵达北平,错过了开会时间,会议改期到21日。10月30日,胡适回到上海,11月28日携家眷乘火车北上,离开了寓居三年半的上海,重返北大任教。胡适此行不走水路是“有所戒也”。此信应写于11月28日前一个星期五,即11月21日,而非10月24日。

“《诗刊》广告”指的是《新月》月刊3卷2期封底的《诗刊预告》,应出自徐志摩之手,但一直被徐志摩全集集录。《新月》1928年3月刊创刊,从第2卷起脱期成为常态,出刊晚于标示的日期。《新月》3卷2期版权页标注1930年4月10日初版,另有一个再版本,标为1931年2月10日再版。从徐志摩为《诗刊》向梁实秋约稿来看,载有《诗刊预告》的《新月》3卷2期,实际出版时间在1930年11月他写信不久后。

梁实秋和闻一多当时都在青岛大学任教。11月底,徐志摩又极力催促梁、闻二人为《诗刊》撰稿。12月19日,徐志摩终于收到梁实秋的回稿,欣然写信表示:“《诗刊》印成了”,并提到时任青岛大学校长的杨振声(今甫):“今甫我也十分想念他,想和他喝酒,想和他散步,为他还是写小说吧。精神的伴侣很好!”《新月》3卷2期有一篇小说《精神的伴侣》,署名秋声,描写一位“学美术、文学又兼爱什么哲学”的大学教师,单身时渴望伴侣,脑中充满性幻想,后来终于娶到漂亮时髦的太太。但他忙于教书无暇陪她出去玩,喜欢享乐的大太太渐与之疏远,有了自己的交际圈,经常玩到深夜不归。他意识到双方性情不同,纵然结婚了,仍然没有精神的伴侣。这样的情节会让与徐志摩有戚戚。徐志摩信中的措辞表明,杨振声就是《精神的伴侣》的作者,故而他用“秋声”来称呼杨振声。2005年、2019年两版《徐志摩全集》在此处用括号订正,写为“秋(振)声”并不妥当,“秋声”别有典故,不是“振声”的笔误。

各版徐志摩全集和书信集中,“精神的伴侣很好”一句皆不加书名号,编者应是将“精神的伴侣”理解成了对写小说的比喻。这一标点方式无形中制造了阅读障碍,导致徐志摩口中的佳作《精神的伴侣》不为人注意,至今没有收入杨振声文集。李培刚撰《杨振声年谱》引用了1930年12月19日徐志摩致梁实秋信,但仅作为一条事迹列出,也未将这篇小说归入杨振声名下,实属遗憾。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世界语的晚清民国之旅

■ 沈洁

观念《世界语与中国之关系》,1927)

另一部分世界语者则走上了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中共早期组织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世界语亦是该校开设的课程之一。1920年俄国记者斯托帕尼在该社教授世界语,最主要的目的是用世界语宣传马克思主义。斯托帕尼还在上海新华学校附设世界语夜校,特设世界语寒假补习科,并曾在这一年邀请正忙于筹建中共的陈独秀、沈玄庐到校演讲。世界语及其中国传播者在中共早期组织力与领导力量的汇聚中起到过最初的关联与直接作用。时人论述世界语与工人的关系:“马克思说‘各国无产阶级都应当一致联合’,如其要和各国同志联合,那就有世界语的必要!……世界语和工人是不应当分离。要结合全世界工人的团体,除了世界语再没有更适当的工具了。”(袁寿田《工人与世界语关系的深切》,1924)

这亦如列宁所说,世界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拉丁语”,是工人阶级的语言,可促使工人实现真正的联合。曾有学者分析过世界语为中学生、师范生和实业学校学生所带来的希望(邓军《制造“希望”:1920年代中等生的世界语想

球,文字相通可造世界和平,其理至确。”文字神圣化是现代世界确立过程中的共同现象,而在中国语境中,其不仅与救亡图存相关,还有特殊指向:去文言化一儒家化一将语言文字文化繁为简一启蒙一把中国从世纪的统治哲学及统治语体中解救出来。文辞是知识的载体,通过白话文、国语、音译等表述格式而构建的统一过程,也是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共同体自我认同型构的典型过程。这一连串的现代方案,均为近代中国语体改革起源阶段的世俗化努力。

世界语在晚清,还有一个饶有趣味的面相——即清廷的世界语努力。过去我们了解的,多是革命派在晚清传播世界语。如刘师培、钱玄同请日本杉荣讲授世界语,刘师培、何震在日本创办《天义报》(《衡报》)鼓吹世界语,刘师培1909年在上海开办世界语讲习所;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在巴黎办《新世纪周刊》,宣传世界语。但其实清廷也在致力于宣传世界语:吴天民主掌的奉天世界语学社,即为当时清政府一机关。

清廷之支持世界语,且以“奉天”为名,是因亦有“进入世界”的愿望。参与其事的主要是满人官员,他们积极推